

用者，因此吾人可說凡與農業有關之貨幣與工藝品，因受中國實施屯田制之影響，吸收漢化已無可疑也。

綜上所述吾人可得一結論，即新疆文化關於宗教方面，如美術、語言、文字受西方文化最深，凡關於政治方面與農墾有關之貨幣及工藝品，受東方文化最鉅，由吾人歷年考查所得，可證明其不誤也。除宗教美術俟將來整理刊布外，今爲表彰漢人在西域之文明起見，故先刊工藝品之一部，即今所編之高昌陶集是也。雖溝北陶器中如彩色單耳餅及圓底陶鉢，因與波斯出土者多相似，余在陶器研究中曾述有受西方文化之嫌疑，但吾人推其年代均認爲紀元前一世紀至三世紀之遺物，則傳入新疆較早，是時漢人勢力尙未普及新疆，及至漢武通西域後，漢文明西漸，此類器物已顯然被其同化或消滅，不然吾人在新疆所見漢以後之古蹟，關於圓底器或彩色陶片亦已不多，至隋唐時代之古蹟則已絕迹而不一見矣。因此吾人論東西文化，須遍觀其全體，深刻檢察，方能追其源流，窮其變化，若此則漢文明遺存於新疆之痕迹亦不可埋沒也。故余於陶集出版後特表而出之，以爲序。

又余編纂此書，經時兩載，雖於萬方多難，身心交困之時，尤復手校筆削，毀版十餘，刪改七八次，如名類之訂比，圖樣之規劃，苦心焦思以求一當，幸得粗告完成。余自慶幸，但個人能力有限，幸得多方之幫助，同人之努力，方得以有成功。今當出版之始，謹一一表白以申謝悃。如徐炳昶先生、袁復禮先生，當余在新考查時，幫余料理並指導一切，使